



詩論

袁水拍譜

論詩与詩

譯拍水袁

北游士林森



詩與詩論

一九四三年渝初版

一九四六年滬再版

一九四八年八月三版

原著者：V.J. Jerome 等

譯者：袁水

藏版者：詩文學社

印刷者：森林印刷廠

基本定價：國幣六圓五角

· 者行刊 ·

森林詩文學社

號五六六箱信政郵海上

目 次

詩 論

變節的桂冠們 (V. J. Jerome)	一
科勒律治和華茨華斯合論 (Joseph Freeman)	二四
惠特曼論 (D. S. Mirsky)	二四
論當代英國青年詩人 (D. Capetanakis)	五〇
反抗中的詩人 (Stephen Spender)	七二
現代詩歌中的感性 (Stephen Spender)	八五
托爾斯泰對於藝術的見解 (L. Tolstoy)	九五
愛列克·紐頓論藝術 (Eric Newton)	一三五

詩

軍火在西班牙 (Rex Warner)	一三三
眼睛 (失名)	一三四
許斯加 (John Cornford)	一三五
給我們這一天 (James Neugass)	一三七
紅土壤的相思 (L. Hughs)	一六七
荆棘之歌 (L: Aragon)	一七〇

變節的桂冠們

V. J. Jerome

歷史常常重複這樣的例子：就是智識份子在人民運動的緊急關頭時叛變了，固然也有許多勇敢地堅持着而始終如一的。在最初的幾個資產階級革命中，當政治變動急速的時候，英法兩國的文化傳播者發生了動搖與退却。他們的徧徨，反映了（即使在它革命的階段）資產階級的半吊子和妥協性。

然而即使他們是不可靠的，智識份子這一集團實在還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角色。因為他們代表了工業發展所招致而來的大量的智識羣衆。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智識份子，為英法的資產階級革命準備了思想意識上的基地。有少數例外的智識份子，甚至對年青的資本主義表示出批判的態度，而更進一步去宣傳空想的社會主義。在另一方面，腐爛的封建主義依舊有足夠的力量，影響一大部份的智識份子去為牠服務。

為了紀念克朗威爾這個英國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的死，那個尚未變節的約翰·德里頓（註一）寫道：

『他的偉大得諸上蒼，

不靠幸運，他自造了英名……

他使我們成爲大陸上的自由人民，

而從前我們則是自然的俘虜……』

那時德里頓是吉爾柏特·畢克林爵士的祕書。他是克朗威爾庭上的御前大臣，曾經審判過查理一世的法官之一。德里頓爲那反抗封建壓迫者的大叛變（Great Rebellion）而寫作辯護，以及稱頌克朗威爾將國王處死的澈底：

『戰爭是我們的消耗，却是他們的盈利的商業；

我們內心流血，他們却延長我們的苦楚；

他爲我們鬥爭，讓我們停止苦戰，

爲了試驗止血，他割開了自己的血管。』

十八個月之後，也就是這個德里頓，寫了一首詩歌頌斯圖亞特朝的復辟，接着就又寫了『加冕頌詩』。可慨的是當『紀念俄立佛·克朗威爾的英雄體詩』的墨跡還沒有乾，緊跟着就是哀念在民主政制期內那年輕的查理的流亡：

『爲了他的遠離，教堂和國家一致悲傷，
教士們瘋顛，朝庭裏發生了內訌：』

有閱歷的老者墮入深沉的絕望，

眼看叛徒們跋扈，皇朝遭殃。』

德里頓現在歌頌着反動的保王主義：

『多猜疑的禽類也不再疑心危險，

在我們國王的保護之下，一切都安全。』

擁護封建制度的反動派恢復了最高的顯要官職，雖則這種恢復並不就是封建制度的復活，可是天主教重新又將牠的觸角伸張到四面八方，國王和他們有祕密的默契更是大家知道的事。於是這個革命的清教徒的詩人改教了，開始皈依了羅馬教會（註二）。

在約翰·德里頓的對面站着約翰·密爾頓（John Milton），是位更偉大的詩人，更偉大的人（註三）。當那些被收買了的胆怯的作家們，背棄共和國而諂媚王朝的時候，密爾頓的發言代表著那最進步的，最堅持的革命的資產階級中的一部份，反抗那兇暴的壓制。他用戰鬥的聲音攻擊那批復辟派，就因為他們『回復到最近被若干騙子們所安排的束縛之中去的那種有害的諷刺』。他挺立着決不妥協，爲了民主自由，爲了政教劃分，爲了共和國，他相信假如共和國能繼續生存的話，牠可能把封建關係一掃而光。這時候並不是德里頓，而正是密爾頓代表着十七世紀的真正的，朝前面看的智識份子——這是

些不領乾俸的，和不帶桂冠的人；他們被羞辱，被禁錮，被吊死。和他們同代的，以及後代的真誠的文化工作者，沒有一個人不尊敬密爾頓的堅貞，無論是貧窮，盲目，保王派的嘲罵的箭，都不足動搖他分毫；後世一致讚美他的超絕的勇敢，和赤熱的忠懷——他的不畏死亡的戰到最後的薩姆生式的戰鬪精神（註四）。

法蘭西大革命像電光一樣，劃過了全世界的蒼穹，爲每一處地方的被壓迫者照亮了爭取自由的大道。「人權宣言」的發表，召喚了全人類向封建寡頭政治作鬪爭，而這鬪爭正日益擴大着，農民大衆，城市工人，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派當中的進步份子，四面八方都集合在這個革命運動之下。在英國，以及在舊大陸和新大陸，對革命的熱烈的同情心普遍於智識份子的各方面。卓越的科學家與文學家們都大大地激動了，其造因是伏爾泰的摧朽拉枯的反牧師主義，海爾維修（Helvitus）和霍爾巴赫（Holbach）的哲學的唯物主義，百科全書派對理性的崇拜，以及羅梭的平等觀與民主思想。

這些智識份子的典型代表，是英國詩人勞白特·蘇賽（Robert Southey）。在他的早年，他是一個熱心革命的擁護者。他的同道詩人是科勒律治和洛伐爾（註五），他創造了一種烏托邦的社會計劃，「萬民平等政治」，想把它在新大陸上實現，「在那兒塞斯刻赫那河正傾注着他的未受束縛的水流」。在蘇賽的革命劇：『華德·推勒』中，那

被捕的約翰·巴爾被控訴，說他是一個叛亂者，煽動百姓，他便這樣回答他的審判官：

『我是約翰·巴爾；但我不是一個叛亂者，

這個名稱要給與那妄自尊大者，

他用強力來反對人民的政權……。

如果這些是罪惡，

爲了人們宣揚那種你所喜稱作怪誕的想法，

說是人類像兄弟一樣，都是平等的，

具有特權的社會是罪惡和壓迫的；

財產權只是一個騙人的戲法，

欺騙那些你所壓迫的——

那麼我承認我有罪。』

雖然如此，就在這個時候，英國的反動的潮流還是把蘇賽捲走了，他開始攻擊法國大革命的恐怖行動。他的失却均衡的感覺，因爲瑪麗·安托奈脫的被處死刑而刺傷了（註六）。

在創作『華德·推勒』之後，只短短地隔開了兩年，他就這樣稱呼人民：『至於豬

，他們也很像羣衆。」（同樣地，在亞歷山大·漢密爾頓的信仰的誓言中，可以看到美國的保王黨對於人民的同樣蔑視的語言：『你的人民，閣下，你的人民是一隻大野獸。』）由於他的這種對羣衆的下流的概念，他的保王黨的主子們就把他升充桂冠詩人。拜倫合適地把這位『桂冠』和『依斯克里亞脫』同押了一韻（註七）。

從這個優越的地位上，蘇賽回頭去懷舊的說道：『縱使那些封建時代很壞，牠們到底比起現在這種商業時代來，少傷害人得多。那種仁慈而寬大的人性，比現代的崇尚名譽和光榮的主義要好得多了。』給蘇賽最好的評語，恐怕只能像一位著名的傳記家所說的：『他既沒有澈底地做一個雅各賓黨人（註八），也沒澈底地成為一個保王黨。』

科勒律治曾經眼紅地隔着海峽眺望那新的法蘭西，認為這是新的英國的典範：

『難道只有法國能夠踢走一個暴君？

難道只有她能夠誇耀，啊，自由，在你的保護之下？』

——科勒律治曾垂下頭『為不列顛的英名哭泣』，現在却開始對於英國的主人們感到贊成和歡欣了。

『在我的靈魂裏，沒有一個感情，沒有一個具形，不是從我們的祖國借來的。』

在英國、在法國、普魯士、奧大利和美國以及別處地方的許許多多的蘇賽們、科勒律治們，他們的變節都正發生在革命的轉變的當兒。無論是城市或是鄉村的羣衆，他們已經充分明瞭大資產階級現在是放棄了對於革命的基本任務。在廢除王權和一七九一年的資產階級與貴族的憲法之後，在一七九二年八月至九月，這些羣衆就廢除了有產公民的立法會議。王權是人民之敵的結合中心，如果不把馳澈於摧毀，民主共和國自然無法實現。結果國王與王后就和外國的元首們商量，一同進行法國反革命的侵略，也是在他們的名義之下，歐洲封建的聯盟就在一七九二年的春天進攻這個青年的共和國；也在他們的名義之下，王政復古派和塞隆特黨（註九）的調和派一同陰謀摧毀革命。

『祖國在苦難中！』當時成爲大革命的口號，來反對國內和國外的敵人。前線的勝利需要國內戰線上的勝利。王政的廢除象徵了革命的登場。

詩人的背棄革命，不過是王黨的散文寫成韻文而已。資產階級怎樣打算，詩人便怎樣推敲。不列顛的統治階級看着這新的共和國越來越不順眼，認爲封建主義在法國壽終正寢，就是表現一個資產階級的敵手國家正開始形成。英國被工業革命所推動，她的目的是想從法國奪取要塞的海峽口岸和東方的殖民地，企圖阻礙牠的工業發展和削弱她的海軍力量。因爲這個緣故，不列顛的資產階級就開始與法國的保王黨以及大陸上的封建

政府狼狽爲奸了。

正像封建的奧大利，普魯士，和俄羅斯一樣，資產階級的英國懼怕着革命的日益緊逼。雅各賓主義風靡於英吉利，蘇格蘭和愛爾蘭。國內的人民對於王黨壓迫的反感，對於政府對法戰爭的憎恨，也日益增長。統治階級被這種恐怖所懾服了，首相威廉·匹特（William Pitt）正像脫下一件寬鬆的袍子，擺脫下他的自由主義，再和革命意識的領導人愛特孟·柏克（Edmund Burke）聯合起來，傾其階級暴政的全力來對付人民（註十）。人身保護律（Habeas Corpus Act）停止實施。同情革命的法蘭西的人士們所舉行的公衆集會，被橫暴地破壞。一切反對王權與貴族的言論，遭到禁止，陳舊的反對一切騷動與危險思想的條律又開始復活。政治犯充斥在監獄之中。

戰爭變成了強制的。英國人民只有用愛國主義的短棒來驅使了，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死刑被藉口爲和法國斷絕外交關係的緣由——和誰呢？和法國的資產階級，他們曾經把一個國王的腦袋從坫臺上滾下來，取得了政權！

這一回，『人性』的仁慈之乳汁凝聚在不列顛外交家的血管中。那些『人道主義』的蘇賽們淌下了一瓶一瓶墨水的眼淚，爲最後的路易王悲悼，這種激情只有後一代的蘇賽們爲最後一個尼古拉沙皇的悲悼，才能比擬。

蘇賽們和科勒律治們，瑪金托斯（James Maekintosh）們和華茨華斯們（註十一），他們都和反動者妥協了，爲了這，他們如願地得到寵幸。詹姆斯·瑪金托斯變成詹姆斯爵士；威廉·華茨華斯被選做桂冠詩人，勞勃脫·白朗寧（註十二）在他的『失掉的領袖』一首詩中，暗指着的就是華茨華斯，這首詩用這樣的行句開頭：

『就爲了一把銀錢，他離開了我們，

就爲了他上衣上扣一條絲帶……』

自尊自重的科學家與文學家要溯源他們的傳統，就得找一些智識份子的領袖如威廉·高特溫（William Godwin），他用他的劃時代的一本『政治正義』答覆柏克的王黨的反動，他勇敢地，流利地爲急進的共和派的『Corresponding society』的領袖們辯護，這個團體在一七九四年反雅各賓主義的瘋狂浪潮中遭到審訊的。這個傳統是如約瑟夫·泊利斯脫萊（Joseph Priestly）這些人遺下的，他在生活中尋找真理，如同他在實驗室中尋找牠一樣；在一七九一年的一個夜間，當他看見那『教會與王家』的伯明罕的暴徒們燒了他的家，他的科學儀器，以及他的寶貴的筆記的時候，他覺得：他即使受到這樣的剝奪，而火星終會能夠爲下幾代點燃起光明的燈來的。他最後逃到了傑佛遜和富蘭克林的美國去。

在一八四八年法國的智識份子們，和大部份的小資產階級，聯合發動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——傅利葉，聖·西門，和卡倍脫（Cabet）的信從者——要求終止王權和銀行貴族的統治。一個紅領巾的波特萊爾（Baudelaire），在六月革命中和工人們一起站在巷戰工事之旁（註十四）。然而那些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，耽心着無產者的前進，開始撤退到財政寡頭的章魚式的掌握裏去了。小資產階級害怕工人階級的力量，甚於害怕大資產階級的上升，於是反叛了六月暴動。他們違背了自己的利益，讓巴黎的無產者被卡凡納克（Cavaignac）的暴徒所殺戮。拿破崙主義的勝利——這一個陰謀的果實，使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變成冷嘲的犬儒主義，他們的波特萊爾現在歡呼着『牧師，軍人，和詩人』是社會的主體；他現在信奉了基督教和專制主義。他曾經陶醉在『共和國的香味』之中，現在却誹謗共和主義者為『玫瑰與香粉的敵人』。他曾經被『一切是人民的，一切爲了人民』的口號所燃燒，現在却墮入悲觀主義的迷惘中，慨嘆着：

『快些吧，讓我們熄滅這盞點亮的燈，

讓我們沒入夜的陰黯中。』

可是工人們沒有熄滅他們的燈火。在他們的失敗的廢墟上，重新又生長起來。他們

從六月的死灰中站起來變成公社的『風雲壯士』。

(註一) 約翰·德里頓(一六三一一一七〇〇年)，是英國十七世紀的一位大詩人及劇作家。

(註二) 英國當時的統治者，本爲斯圖亞特王朝，係採取絕對的君主專制政體，對人民壓迫甚烈，因此引起國內之革命運動。一六四五年六月間革命軍大勝王軍，查理一世幾乎被俘，此後革命浪潮繼續高漲，鎮壓了各地的保王黨的活動，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國王查理一世以叛國罪被控訴最高法院，判處死刑，繼而就建立了克朗威爾的共和政體。一六五八年克朗威爾病死，所謂一六四〇至一六六〇年英國的第一次資產階級的光榮革命，也就告一結束，查理二世於一六六〇年後復登王位，反動的復辟時期就又從此開始。它重新網羅了所有的反動份子，並熱烈擁護羅馬的天主教，仰仗天主教的勢力來作君主政體的支持者，對民主力量壓迫也更甚。

(註三) 約翰·密爾登(一六〇八——一六七四年)，英國大詩人，著有長詩『失樂園』等。

(註四) 薩姆生是『聖經』中的一位頑強的以色列的英雄和力士。

(註五) 勞白特·蘇賽(一七七四——一八四三年)，是英國的大詩人及音樂批評

家；科勒律治（一七七二——一八三四年）也是與蘇賽同時的大詩人，名著有『古舟子詠』。

（註六）瑪麗·安托奈脫是路易十六之后，後上斷頭台。

（註七）依斯克里亞特是那個出賣耶穌的門徒猶大的姓，此處含着出賣了終身的詩人之意。

（註八）雅各賓黨人是法國大革命中最革命的一派，由羅伯斯庇爾做領導。

（註九）基隆特黨人是法國大革命中右派，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，後與王政復古派妥協成爲反革命的力量。

（註十）愛特孟·柏克（一七二九——一七九七年），是當時英國的一位政治家，又是反動派的思想的代表人。

（註十一）瑪金托斯（一七六五——一八三二年），英國的政治家及歷史家，華茨華斯（一七七〇——一八五〇）則是當時一位著名的湖畔詩人。

（註十二）白朗寧（一八一二——一八八九年）英國的名詩人。

（註十三）高特溫（一七五六——一八三六）是英國一位著作家，一生爲正義而鬪爭。泊利斯特萊（一七三三——一八〇四年）則是同時的一位大科學家，後被迫害，